

# 留学生之父的上下求索

——容闳的“西学东渐”尝试

□杨彦华 陈恒才

1912年4月22日，美国康州《哈城日报》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：

“身为学者、政治家及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容闳博士，昨日上午十一点三十分，在他的沙京街284号寓所去世……

他对于过去一年来中国急剧进步变动密切关注，因为他毕生曾努力于此……”

容闳从赴美留学，到学成归国，到向太平天国提政治建议，到筹办江南制造局，到组织中国留学生出国留学，到参加维新变法遭到清政府的通缉，到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暴力革命，他的一生是一条追寻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求索的一生。

## 他选择了回家

容闳于1828年生于香山。1839年他所上的小学是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夫人开办的。他的父母认为他会一点英语是有好处的。容闳后来回忆说本来自己的兄长读的是私塾，唯独他送到了西学，想必父母看到通商之后洋务慢慢变得重要了，父母希望儿子能出人头地，“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”。他后来升入莫里森学校，此时主持校务的是布朗牧师。1847

容闳，他从赴美留学，到学成归国，到向太平天国提政治建议，到筹办江南制造局，到组织中国留学生出国留学，到参加维新变法遭到清政府的通缉，到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暴力革命，他的一生是一条追寻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求索的一生。

年，布朗回美国时将其最好的三名学生带回了美国，容闳是其中之一，另两位是黄胜和黄宽。这三个男孩一同进入马塞诸塞州的芒森学校，他就住在布朗先生的太夫人芒森家中，并受其影响他信奉了基督教，1876年他将自己的头生子洗礼命名为莫里森·布朗，其用意很容易理解，他在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。

容闳在马萨诸塞度过两年半后，尽管时间短促备考不足，但他还是在1850年考上了耶鲁大学。在耶鲁大学，他擅长的是写作和哲学，还有英文演讲。在整个大学过程中，他都在与贫困交战。他对生活的艰苦并不惧怕，洒扫拂拭劈柴生火都“甚乐为之”，“雪深三心，亦必徒步”，不断地为人工作，替同学办伙食，替“兄弟会”管理图书等等。他是穿着长袍留着辫子进入大学校园，不过一年之后他就将这两样东西摒弃了。

容闳在毕业后受到了来自于自己的挑战，他在美国呆了很长的时间，他已经是美国公民，他的兴趣、情感和爱好，如同一直长在美国一样，他连中国话都不太会说了，中国对他来说反倒像是一个“异乡”。他回国可能会受到歧视、猜疑和敌对，但他的正义感和报恩之心最终战胜了他的私心，尽管他无法预料会有什么降临到他头上，他还是选择了“回家”。

毕业后不久，他坐船去香港，经过长达151天的航程，于1855年4月到达香港。



容闳在耶鲁大学的毕业照

## 现实中处处碰壁

在香港他遇到比读书时的贫穷更让他困扰的现实，他先是希望能充当美国特派员派克的秘书，人家不理睬他的期待。他又希望得律师一职，不久，香港的那帮律师联合起来排挤他，他不得不放弃做律师的打算。1856年8月，他离开香港去了当时风气较为开化的通商口岸上海。他后来回忆



自己的选择觉得离开香港是一大幸事，“假如我把自己束缚在这块荒芜多石的殖民地上，我就不会接触到中国的思想主流。”他在香港的唯一收获就是认识了太平天国起事流亡到香港的洪仁玕，他们成了知己。洪仁玕后来在天京拟定的《资政新篇》有很多都有容闳、黄胜、黄宽对中国近代化的思考。

容闳到上海的时候上海已开埠十几年了，这时候的上海已取代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。此时得风气之先的“香山买办”群体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期间。唐廷植、唐廷枢兄弟是容闳莫里森学校的同学。他本可以很顺利地充当买办，但容闳称这个职业为“奴隶班首”，他无意于此职业，而是在海关谋到了一份差使。他在海关工作的目的也是想结识地方大员，实施自己“致中国于文明富强之境”的计划。



晚年的容闳

在试用的三个月里，他发现海关积弊很多。总税务司年俸高达 6000 元，通晓中英文的头等通事月薪只有 100 元，中文方案月薪 20 元，巡航水手月薪 30 元。收入相差如此巨大，难免不贪污受贿。容闳说，在这个新职位的三个月的试用期以前，我发现事情并非如我想象的那样，假如我打算洁身自好，使个人品格不受玷污的话，我就不可能长期在这里工作。

一个月以后，他终于辞掉了海关的工作选择了洁身自好。包括唐廷枢在内的友人都认为他丢掉了 200 银元的

“光辉事业”令人遗憾，只有蠢货才会这么干。

从 1855 年到 1857 年归国两年多他已经失业四次，直到 1857 年底曾寄圃介绍他到宝顺洋行工作，宝顺洋行意欲让他去驻长崎代理处当买办，他拒绝了，理由是：买办固然是一个赚钱的好差事，但终归是奴仆，作为美国第一流学府耶鲁大学的毕业生，他不愿意给母校丢人，他爱惜母校的声誉。这事最终由徐润担当了，容闳只作为协助。

容闳归国后五年里，他兴致勃勃地寻找富国之路，自己也早过了而立

之年，感情生活却是一片空白，有人问他是否愿意找一个缠足的年轻女子做妻子，他幽默地表示要找一个和自己一起跑步的妻子。这个愿望实现起来比较困难，一是他既没有一个能和自己跑步的中国姑娘可以娶，又没有一个能跑步的外国姑娘愿意嫁给他。

## 失望的天京之行

1860年11月19日，容闳在天京见到了老朋友洪仁玕，此时的洪仁玕已今非昔比，已被封为“干王”（什么实权都没有，称干王真的再合适不过）。对容闳的到来，洪仁玕深表欢迎，问他能否留下来共创千秋大业。

容闳见到了太平天国的种种陋习，他后来在回忆录《对于太平天国战争之观感》阐述了自己的观点，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是因为清政府腐败，而其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纪律松散和道德堕落，他断言太平天国是农民式的革命，既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，也不能把中国引向一个光明的未来。

当洪仁玕挽留他时，他提出了振兴太平天国、改造中国的七条方案：

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建立一良好军队；建立武备学校，以培养一批有学识军官；建设海军学校；建设善良政府，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，为各部行政顾问；创立银行制度，及厘定度量衡标准；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，以耶稣圣经列为主课；设立各种实业学校。

他的这些治国方略在那一群农民起义者手中看似可笑，可想而知，容闳是欣然前来，怅然归去。

他在回忆录中说：“这次叛乱的唯一良好后果，就是上帝借助它作为一种动力，打破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死气沉沉的气氛，使他们觉醒，意识到需要有一个新国家。”

## 办成了两件大事

容闳在太平天国那里没看到希望，但他却在1863年找到了曾国藩，他希望曾国藩实现自己“西学东渐”的计划。





1881年回国前合影

这一次他总算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。接下来至少办成了两件事：第一件是在中国建成了第一座完善的机器厂——江南制造局；第二件是在中国组织了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出洋——120名幼童分四年赴美留学。

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创始人之一，也是最早由封建官僚转化为洋务派的人物。“洋务”是由“夷务”一词转变而来。原是泛指与西方资本主义有关的一切事务，如外交、通商、传教以及输入西方资本主义的武器、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等。1861年，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则是洋务运动的开端。内军械所造炮、造船全用土法，产品低劣，尚处于初级的摸索阶段。

1863年，曾国藩在安庆曾召集了有关算学、天文、机器等百余人，研究如何兴办洋务，还特意征询容闳的意见，问他“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、最重要之事业，当从何处着手”，容闳建议先设立一座西式机器母厂，“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，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”。曾国藩深受启发。自此他才认识到首先发展机器制造业的重要。因此，12月3日派容闳赴美购置机器，为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创造条件。江南制造局的开办意味着洋务运动真正展开。

1868年，容闳向刚升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提出了派遣留学计划。丁日昌决定让容闳写成详细说帖，他代为上呈权位仅次于恭亲王奕訢的军机大

臣文祥，请其代奏。但恰逢文祥父亲去世，文祥离职回家守丧，帖也就不了了之。但容闳每次因公谒见丁日昌时都提此事，并恳请转呈曾国藩。1870年，容闳再次催促丁日昌向曾国藩重提留学计划。这一次的条陈也打动了曾国藩，他同意领衔上书，奏请朝廷派遣子弟出洋学习。很快，曾国藩和李鸿章联衔会奏获得旨准。

1872年夏，容闳组织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渡洋赴美，中国留学史大幕开启，曾国藩却不幸于一年前的1871年冬去世。他临终专门交代，幼童留洋事务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主管，可见，曾国藩晚年对幼童留洋的重视与期望。

容闳特别欣赏和敬重曾国藩，在回忆录中说曾“可称完全之真君子，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”，“一生之政绩、忠心、人格，皆远过于侪辈，殆如埃浮立司脱高峰，独耸于喜马拉雅诸峰之上。”

而对于自己的抱负，他是这样阐述的：“我出国八年后重返中国开始。一向被当作西方文明表征的西方教育，如果不能使一个东方人变化其内在的气质，使他在面对感情和举止截然不同的人时，觉得自己倒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似的，那不就可怪了吗？我的情况正好如此。然而，我的爱国精神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减；正好相反，这些都由于同情心而加强了。我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：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，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。”

1874年，容闳去避难山教堂拜访好友杜吉尔牧师时，遇到了自己命中的能跟自己一起跑步的妻子——玛丽·凯罗克小姐。47岁的容闳和23岁的玛丽堕入爱河。1875年，在好友杜吉尔牧师夫妇的撮合下，容闳和玛丽在哈特福德市避难山教堂举行婚礼。年龄的差距和生活习俗的不同并未影响容闳夫妇的感情，婚后，容闳夫妇举案齐眉，恩爱异常。家居的时候，容



容闳的美国妻子玛丽·凯罗克



闳仍然穿着传统服装，玛丽开始学中国话。1876年6月10日，他们的长子容瑾彤出生。1879年，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容瑾槐也诞生于世。几年中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

然而，好景不长，洋务运动最终宣告失败。1881年留美幼童被急招而回。随着幼童留美事业横遭摧残，容闳心境越来越差，其妻玛丽的健康也极为不妙。到1883年，她已经不能说话了，只能用嘶哑微弱的低语面对自己心爱的丈夫。1885年冬天，玛丽的食欲日渐衰退。终于1886年6月28日逝世，容闳为此陷入巨大的痛苦中。这位不大使用诗文的人也赋诗一首以表自己的落寞：

弥年不得意，新岁又如何？  
念昔同游者，而今有几多？  
以闲为自在，将寿补蹉跎。  
春色无新故，幽居亦见过。

不过，他并没因此中止自己求索的一生，他在1895年回到中国呼吁政治改革，并由此积极参加维新派的活动，曾被选为“中国国会”会长。后在逃亡日本途中巧遇孙中山，他的思想由最初的改良变成了革命，他非常积极支持革命，拥护共和。

1902年，遭清廷通缉的容闳打算回到美国。那年他74岁，自知此一去美国，再无回来之时。临行之前，他想再看看的地方，仍是故乡南屏。皓首苍颜的容闳在南屏为列祖列宗上香，叩别了父母坟茔，才怆然而去。

1912年4月21日，84岁时在美国康州哈特福德住处去世，著有《西学东渐记》。

直到生命的最后他再也没有回到过自己魂牵梦萦了一辈子的祖国。容闳的西学东渐尝试近代留学生之父艰难地实践中国现代化之路。